

史海回眸

回眸《江海春秋》

□钱泽麟

引言:市史志办创办《江海春秋》期刊已经200期了,笔者回顾参与征集编辑的过程,不禁感慨万端。《江海春秋》原名《南通今古》,是市地方志办公室于1987年创办的杂志。



市史志办创办《江海春秋》期刊已经200期了,笔者回顾参与征集编辑的过程,不禁感慨万端。《江海春秋》原名《南通今古》,是市地方志办公室于1987年创办的杂志。1996年,市地方志办与市委党史办合并(简称市史志办)。主任室考虑到我曾在报社当过编辑记者,又在市委研究室搞过《沿海经济》杂志,便让我分管杂志,兼任主编。

办刊思路,受到上级领导和同行的认可

1997年杂志改版寄语中有这样的表述:“我们决定面向现实,面向读者,对杂志作一次较大的改版,从形式到内容,给读者展示一个全新的形象。我们的使命不仅要给后人留下历史,更重要的还得引导人们重温过去,以史鉴今,资政育人。”我们提出要办成“集思想性、史料性、知识性、可读性”于一体的办刊思路。

把思想性放在首位,这是前提。就是要有理论性、指导性,要让广大读者开卷有益,获得精神上的收获。其次强调史料性,这是根本。要为出版市志、编纂年鉴和开展史志工作服务。第三强调知识性,这是基础。广采博引,让读者有所感悟和启迪。还要强调可读性,这是关键。我们反对空洞乏味、党八股式的文章,反对虚无缥缈、华而不实的稿件,要力争适合各种读者的口味,让人们看得下去。总之一句话,要在提高刊物的文化品位上下功夫、花气力。在实际操作,我们要求实事求是,所写稿件,编纂文章,都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1998年3月中旬,全省地方志期刊工作会议在南通召开,省地方志办主任王建中要求笔者在会上作了经验介绍。会议认为南通办好期刊的经验值得全省各市县志部门学习和借鉴,将为今后续修市县志和创建年鉴精品提供理论基

础,做好资料准备工作。在全省党史系统,《南通今古》杂志也是名列前茅,经常受到省委党史办主任王玉生等领导员的赞扬。省内同行多次来本办学习、交流、取经。后来,时任市委书记罗一民也认为:《南通今古》坚持正确的办刊方针,熔思想性、史料性、知识性、可读性于一炉,为宣传南通和我市的三个文明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精心评选:20世纪杰出人物和重大事件

21世纪到来之前,史志办有幸参加了我市20世纪杰出人物和重大事件的评选。根据市委分管领导的指示,这次活动由广大市民推荐,市史志办和市档案局、南通日报社联合举办评选。本办期刊编辑部负责具体工作。

几个月来,我们接到不少推荐信件和电话。评选工作犹如大海捞针,令人眼花缭乱。终于在新世纪来临之际与全市人民见面。

评选出来的20世纪20位杰出人物是张謇、吴亚鲁、刘瑞龙、顾民元、韩紫石、郭锁珍、赵丹、季德胜、陈世魁、李吉林、王个簃、葛菲、杨乐等;20个重大事件是南通建立共产党组织、创建红十四军、反日伪“清乡”、苏中战役七战七捷、南通解放、海安角斜获“红旗兵团”称号、我市被评为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建设“海上南通”、成为体育“世界冠军摇篮”、交通巨变、从“莫文隋”到江海志愿者等(详见《南通今古》2001年第一期;《南通日报》2001年1月1日)。

评选先进得到市领导和群众的认可和赞赏。但必须说明的是由于我们才疏学浅,生活阅历亦不够丰富,总觉得难免有所疏漏、失误和遗憾,那就让我们的评选典型和广大人民心中喜爱的其他人物事件共存吧。

韩国钧主持江北运河修复堤工程

□程太和

1931年夏,苏北里下河地区遭受罕见的洪涝灾害。7月下旬,宝应县降雨量593.5毫米,房屋大片倒塌,田庐淹没不计其数。7月24日,扬州淫雨为灾,城内街市全成泽国,汽车交通全停,天宁门水关城墙倒塌,北水关冲垮。兴化县城南城门成为“南水关”,居民进出城撑舟代步。8月3日,苏北大运河水势日涨,下游溢甚。昭关、三河闸已涨至2丈2尺6寸,车逻归海大坝已开。大运河西南各乡田河相连。8月23日,江都红十字会除筹款购办干粮分别散发灾民外,向全国救济总会及社会慈善机构和个人乞助赈款。扬州在苏唱街育婴堂、便益门等处设捞尸埋葬办事处。8月26日,高邮湖西圩破堤,里运河河堤决口46处,里下河地区1226万亩农田失收,倒塌房屋260万间,淹死、饿死7.7万多人,仅高邮挡军楼一处就死伤、失踪1万多人,在秦皇庙附近捞尸2000多具。

里下河大水灾令全国震惊。这次水灾充分暴露了国民党江苏省政府在治理江北运河方面严重失职。面对水灾,国民党江苏省政府束手无策,只能延聘原督办江苏运河工程时期的河工专家重新出山。9月上旬,江苏省政府组建了江

北运河工程善后委员会。时任省政府主席叶楚伦为主任委员,原督办江苏运河工程局参赞王宝槐为工程处长,原督办江苏运河工程局上游堤工事务所坐办方立钰为工程款委员。9月12日,善后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加推原督办江苏运河工程局参赞徐鼎康兼任工程款委员。

韩国钧在北京。他接到相关消息后,立即返苏,一路勘视灾情。10月8日,返回乡里。10月16日,即接到叶楚伦的邀约,商讨江北运河修复堤工程。11月26日,江北运河工程善后委员会加推韩国钧为副主任委员。事实上,韩国钧就成为运河修复堤工程负责人,叶楚伦仅是挂名而已。

水灾发生后,江苏省政府举全省之力加快决口堵口工程。随着堵口工程告竣,修复全堤一事提上日程,由谁来主持修复工程是一个难题。江北运河工程善后委员会先后推王宝槐和陈和甫担任,均为二人坚辞,究其原因堤工破坏严重,而修复堤工程时间紧迫,经费又严重不足。12月30日,新任省建设厅厅长董修甲提议将建设厅工程处改组为江北运河工程善后委员会驻扬州办事处,全力主事江北运河修复堤工程,并公推韩国钧驻扬主持工程。此决

全办动员,全力以赴撰写重头文章

《南通今古》刊登的重要文章较多,下节将提及,现在挑几篇看一下。

张绪武曾告诉我,江泽民总书记在1994年8月27日与他谈话时说过,儿时一至三岁时曾在南通住过,那时其姐江泽芬六七岁,住在哪里呢?

2001年底,听说江上青烈士女儿江泽慧、刘瑞龙女儿刘延东要来南通寻访父辈在南通的史迹。市委领导十分重视,周福元书记把我和市委办公室主任孙应杰叫到他办公室,要求我们在近期内理清江石溪一家在南通工作和生活的轨迹。我们当即行动起来。张建民和编辑部的同志负责查阅《南通市志》《南通今古》《缅怀》《扬州志》及市交通史、市电力工业志等大量书刊资料;陈红和党史处的沙锦程、陈俊华、徐寰、朱慧等在短短的几天里分头去采访了原通明电气公司的老人和家属、柳家巷15号大院的新老住户,以及对当地文史有研究的姚谦、张自强等人。还包括本办其他同志曾到上海、扬州等地采访所获得的有关信息。姚毅和秘书处的王春、单志浩、朱茜、陈云也提供了不少资料。据此,由我执笔写了《江石溪先生一家与南通》。

2002年元旦期间,江泽慧、刘延东来通考察,也是为江泽民来通打前站。江泽慧对我们说:“可能我大姐江泽芬还能记得当年确切的住所。”我们专程去姜堰请江泽芬过来,认定了在柳家巷15号内那座她家曾住过的带院落玻璃门的三间头房子。详见笔者和徐建红、张惠平撰写的《还记得70多年前的南通城吗——访江泽芬老师》。这就为此后江泽民来通视察,做好了前期准备。

《今古拾穗》——《南通今古》百期选编

2005年,迎来了《南通今古》第100

期。主任室决定,从100期中精选100篇文章汇集成册,由我和本办方志专家何惠斌、沙景程任正副主编。见新华出版社出版《今古拾穗》——《南通今古》百期选编。

精选入册的文章不少是名人的佳作,或者是写名人的。且看一些文章之题:梁灵光《功勋卓著无私无畏——纪念粟裕同志》,杨乐《知识分子的贴心人——忆曹从坡同志》,海笑《迷人的南通海滩》,张柔武《豆蔻年华留永芳——缅怀五妹张聪武》,穆短《南通知识分子的百年历程》,陆植三《当年曾面聆王若飞教诲》,郑祖安《长江北岸第一港城的真实画卷——评新编南通市志》,孙乃昌《试论文化建设与区域共同发展——浏览南通市志新想》,吴镛《回顾一场争论》,顾嘉禾《长寿时代话长寿——来自长寿之乡南通的报告》,朱佳木《父亲朱理治的一生》,吴良镛《关于张謇与南通“中国近代第一城”的探索和随想》,顾浩《黄河流·濠河夜游》,徐仁祥《刘瑞龙与红十四军》,徐建红、李琦、钱泽麟《实践,永远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访原省政协副主席胡福荫》等等。

值刊物创刊百期之际,众多领导、专家、学者、作者、读者发来热情洋溢的贺电、信函。有老领导梁灵光、陈焕友、顾浩、王湛等。其中省委党史办主任俞黑子是作家,他的贺词很有意思:“胜境东南方,文峰海通江,风流写今朝,史记千古长。”每句词第4字组合起来就是“南通今古”。原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市政协副主席施景钤“写在《南通今古》百期出刊时(代序)”中提及:时常听到京都省城政界学界一些学者和领导的称赞:“一册在手,足见南通文化底蕴深厚。”正如全国政协常委张绪武给《南通今古》编辑部来信之所云:“想不到家乡的刊物办得如此丰富、朴实、风采、美感”。

有了前期夯实的基础,《江海春秋》必然会锦上添花。最后用一首小诗来作结束语:《南通今古》出精品,《江海春秋》再创新。辛勤耕耘结硕果,二百佳期见真情。

陶行知:
以张謇为师的教育家

□姜松延

陶行知(1891—1946),安徽歙县人,教育家、思想家。他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教育理论以及“爱满天下”的教育情怀与实践,对近代中国教育发展影响深远,开创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典范,被毛泽东誉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作为近代教育群体中的社会名流,陶行知的教育生涯深受张謇先生的影响。陶行知与张謇的直接交往始于20世纪20年代任教东南大学时。受张謇影响,陶行知产生了创办一所乡村师范学校的想法。在开办晓庄师范之前,陶行知就办学之事专门向张謇请教。张謇告诉他首先要学会学习农民,与农民打成一片。后来,陶行知曾在一次演讲中说:“我搞生活教育,张謇是我第一个先生。”

张謇和陶行知年龄悬殊,但因为有着共同的民族责任感和教育兴国的理想,使得彼此在南通有了交集。1919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杜威去日本讲学。作为杜威的学生,陶行知极力邀请杜威来华讲学。张謇得到这个消息后,非常重视,立刻发出邀约,终于促成了杜威先生于1920年6月的南通五日行。在通期间,杜威在更俗剧场和唐闻三次发表演讲,为南通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

1922年4月至6月,南通、如皋等地被中华教育改进社(陶行知任主任干事)作为调研对象,组织进行心理测验,为国民教育的改革发展提供了依据。

同年8月20日至24日,中国科学社第七次年会在南通崇海泰总商会召开,作为社会名流、教育界的重要人物,陶行知应邀参加了这次年会。会议期间,社员们参观了大生纺织公司、纺织学校、大有晋盐垦公司等,所到之处,陶行知不胜感叹,流连忘返。参观了博物院后,梁启超、杨杏佛、竺可桢、丁文江、陶行知和张謇等还在藤东水榭开会。晚上,与会代表在更俗剧场观看了伶工学社学生演出。南通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给陶行知一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5年6月,江苏省第五区民教研究会在南通东公园省民教馆开幕,研究会特邀陶行知于20日到会演讲,讲题为《普及教育问题》。有报道称:“陶氏讲演,诙谐百出,力言我国教育病态,最后指正正当途径,听众虽历四小时,面毫无倦色。”

说到陶行知与南通之间的联系,在教育界影响最大的当属他与小学生刘宝璠的故事。

1935年7月,陶行知在南通师范附属小学推广小先生制。他念了一首自己写的诗:“不做工,要吃饭,什么人?王八蛋。要吃饭,不读书,什么人?老母猪。读了书,不教人,什么人?不是人。”他通俗有趣的诗把学生们逗乐了。

这时,8岁的刘宝璠站起来认真地说:“陶先生,‘什么人?不是人’,可不大好。‘不是人’不具体,桌椅不是人,鸡鸭也不是人。‘不是人’还有点骂人的味道。”“真的,你说得很对。‘不是人’的确像骂人。请你给我改一改怎么样?”陶行知诚恳地说。刘宝璠当然不知道陶行知是一个留洋博士、大学教授,他想了一下说:“有了,改成‘木头人’怎么样?木头人是比喻,有一个具体的形象。”陶行知拍案叫好:“好,改得好;读了书,不教人,什么人?木头人。”他将诗抄在纸上,又特意写上:“南通刘宝璠小先生代我改诗,我多了一位小老师了。”

这个故事,使陶行知提倡和践行“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教育理论以及“爱满天下”的教育情怀,更加深入人心,也使陶行知“人民教育家”的形象深深印入人们的脑海里。

朱兆蓉悼念西泠同人

□彭伟

如篆籍篆刻家、西泠印社早期社员朱兆蓉,曾为几位西泠印社社员或其家人撰写过悼诗挽联。

一位是汪曼峰,名敏,杭州人,民国第一任杭县知事,对于西泠印社贡献良多。夫人逝世,汪曼峰解组辞职,朱兆蓉作《汪曼峰德配谢夫人永逝哀挽联,为挽四绝》,一显两家情谊较深。

一位是周李光(1886—1916),字六介,浙江乐清人,清末秀才,辛亥革命时期,率领先锋敢死队,光复杭州,后又参与金陵战役,民国第二任杭县知事,为西泠印社保存柏堂、竹阁区域作出贡献,成为赞助社员。1920年,西泠印社为周氏立像。其侄又是画家、西泠印社原理事周昌谷先生。朱兆蓉撰有对联《挽周六介大令》两则:

苏内翰武林受代,京尘未踏,遽赴修文,我今掌录湖山,可无君志,论咸淳集益长庆;
杜少陵牛酒交倾,国士云亡,便挥老泪,况复高堂霜雪,奚止哭东,陋乡梦西浙晋声。

故乡有此好湖山,君曾坐治,三年棠荫常留,白社苏堤同不朽;

旧政未告新令尹,谁料变生,一旦瓜期甫代,赤符青鸟遽相招。

第一则对联中,朱兆蓉将周六介誉为杜甫、苏轼,崇敬之心,跃然联中。第二则上联,尤为精彩:意为周李光的家乡浙江湖山风光绝佳,他主政杭州,三年来的从政惠民将与白社苏堤一样,不朽于人世。所谓棠荫,即棠阴,指周氏的惠民,包括保护西泠印社。周李光、朱兆蓉死于同年。晚年朱氏,病魔缠身,依然奋笔疾书,写下长联佳句,悼念友人,可见两人友情颇深。

还有一位丁立诚(1850—1911),杭州人,字修甫,号辛老,光绪乙亥科举人,藏书家、目录学家,多藏西泠八家刻印,西泠印社早期社员。生子丁辅之,西泠印社创办人之一。宣统三年八月,丁立诚离世,朱兆蓉作《挽丁修甫孝廉》:

善果定前身,游戏人间六十载,遂令羽化登仙,纵家难国忧,瞑目不教看世变。
缙绅宝遗稿,联吟湖上三五同侪,未几已成陈迹,对荒烟蔓草,悲怀无那感秋深。

征稿

“城市记忆”设有传家宝、老照片、史海回眸、地名掌故、老建筑、历史人物等栏目,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来稿尽量图文结合。

投稿邮箱:574911059@qq.com